

劝学书

[日] 福泽谕吉◎著
柯泓◎译

近代日本文明开化、治国兴邦第一书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代表作品

每十个日本人就有一人购买的日本版《常识》

了解日本的生与死，莫过《日本论》

探究现代日本的形成，尽在《劝学书》

知名日本文化学者李长声、资深台湾书评人傅月庵诚意推荐

光明日报出版社

学 书

福泽谕吉



著

柯泓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劝学书/(日)福泽谕吉著;柯泓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112-1311-2

I. ①劝… II. ①福… ②柯… III. ①近代哲学—日本 IV. ①B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0944号

劝学书

著 者:[日]福泽谕吉 著 柯泓 译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高 迟 毛文丽

装帧设计:谭锴 & 苗苗 责任校对:郭政君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50(咨询),67078237(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20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1311-2

定 价:2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从西装到劝学

李长声

日本时兴用假名照搬外语发音，例如西装，本来叫“背广”，现而今说这个汉字词已显得老气。明治年间(1868~1902)他们用汉字翻译西方词语的含义，很多译语也一直被我们汉字本家受用，例如共和国。不过，中国被打开国门在先，横滨开港，擅于做西装的裁缝是渡海而来的中国人，一说“背广”当初由中国译制，类似于固有的背心，随手艺东传。日本现在还常用的汉字词，例如离婚、保险、化学、地球、民主、公约、国会、合法，都是从中国拿来的，帮助了明治维新。仿造是日本人的看家本领，中国造出个“电报”，他们就照猫画虎，仿造了“电

话”一词。福泽谕吉是个中高手，例如版权(后来日本改用著作权)。不单造词，还写了一本《西洋衣食住》，图文并茂，告诉日本人西装比和服便于作战，以及西方人种种活法。几年后明治政府开会研究服装问题，参与大政的副岛种臣以胡服骑射为例，说服保守派，布告天下，“尔今礼服采用洋服”，取代了衣冠束带。这些事情就叫做文明开化，此语出自福泽1875年出版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一时间，剃了发髻的脑壳敲一敲都是文明之声，不吃牛肉火锅的家伙就是不开化。

福泽谕吉是明治日本最大的先知先觉，最著名的作品是《劝学书》，广为人知。其实，他在此书上并不曾特别用力，因为不过是大病初愈，回乡接母亲来东京，随手为家乡开办学校撰写的招生宣传，鼓动不知路在何方的乡下年轻人来上学，学会真本事，走遍天下都不怕。大概又打算用作他创办的庆应义塾、英语学校招生，1872年公开印行，竟大畅其销。两年后接着写下去，共十七篇，1880年合为一册出版，并加上《合订本之序》，就是说，书名用汉字是写作“学问之劝”。洛阳纸贵，总计销售了340万册，按当时人口约3480万来算，读者之众，无疑有启蒙之功。

《劝学书》第一篇(初编)主题是为了自身独立，一家

独立，天下国家独立，人人都应该学习通常日用的实学，而学习西方学问是个人取得成功的捷径。此篇可说是福泽思想的概要，其后各编详解其内容，并教说处世哲学、生活态度、成功秘诀。劈头第一句最为有名：“上天既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此话本来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引用的，这种天赋人权的思想在明治之初被广为介绍，但二次大战之后变成了福泽的名言。

对于他来说，在进步还只是希望的年代，这句话是满怀激情写下的。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父亲是一个小诸侯国(藩)的下级武士，通晓汉学。福泽十四五岁始志于学，起因是左邻右舍都读书，唯独他不读，面子上过不去。读四书五经，通读《左传》十一遍，能背诵有意思的段落。在江户幕府执掌天下的时代，等级森严，家庭出身决定他不会有出人头地的希望，父亲甚至想让他出家当和尚。福泽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每想起此事，就愤恨封建的门阀制度，并体谅亡父的心事而独自流泪。为了我，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渴望平等，追求自由独立，十九岁游学长崎，学习兰学，通过荷兰文掌握西方文化。观光1859年开港的横滨，发现荷兰语不通，转而苦学已称霸世界的英语。给军

舰司令当随从，而不是做翻译，便避开英语尚浅的障碍，得以去美国大开眼界。他突然问，华盛顿的子孙如今怎么样，人家冷淡地说不知道，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脑袋里还装着日本的门阀观念。借助于英语汲取西方思想知识，用儒学教育训练出来的头脑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加以思想化，落笔便写出“上天既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直击门阀制度。人有贤愚之分是学与不学造成的，勤学而通达事物能大富大贵，这样的思想应该也取自中国长达千余年的科举，学而优则仕。体验具有一般性，思想便带有普遍性，人们很乐于接受。但人人平等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上学，倘若不学习，没学问，则难免受穷，只能当人下人。明治政府突然把阴历改为阳历，世上混乱，福泽撰写《改历辩》，替政府说话：“日本国中的人民怀疑改历的必是无学文盲的傻瓜，不怀疑的必是平生用心于学问的智者。”说到底，在福泽眼里，人并非平等。福泽的教化对于日本人形成近代世界观影响非常大。他们向来以教育程度高自傲，鄙视其他民族，根子也就在这里。

对于明治维新大有人反对，尤其在那些几乎被抛弃的边鄙之地。福泽家乡就有人认为，当权者净是把灵魂出卖给外国的实学派，只是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平民生活没

变好，福泽更是个里通外国的国贼。趁他回乡之际，一个远亲而近邻的人策动暗杀他，但两次三番都未得下手。福泽彻头彻尾地崇拜西方，主张全盘西化，亦即近代化。美国用炮舰敲开日本封闭二百年的国门，这是干了一件大好事，但福泽也别有爱国心。《劝学书》中写道：“如果国家受到侮辱，全日本的人民都应该舍命抵抗，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国家威信，才能争取到一国的自由独立。”或许是眼见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从而产生爱国心。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过，报国心与偏颇心，名异而实同。福泽的爱国之心偏颇在脱亚。既要脱之，必先诬之，他1882年创办的《时事新报》肆意贬损亚洲，煽动向朝鲜出兵、对中国开战的民族情绪。常有人说，日本人骨子里瞧不起中国，这根骨子正是福泽带头给日本人换上的。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曾写道：“新日本真正诞生的日子是使中国屈服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甲午战争打败了大清之日，日本从此才像是走出千百年中国文化的阴影而自立。福泽欢欣之余，似乎也看见启蒙所种下的恶果，1897年给弟子写信，言道：“看世上该忧患的事情很不少，近来国人过分热衷于外战，终将不堪收拾。”当时自由民权派批判福泽谕吉撒谎吹牛，由外交官转身为基督教牧师的

吉冈弘毅更明确说他是“图谋使我日本帝国变为强盗国之人”，“结怨四邻，受万国憎恶，必给将来留下不可挽救的灾祸”。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荀子著有《劝学》。1898年张之洞也写《劝学篇》，虽然与福泽谕吉著书前后相差二十年，但所处国情不同，出发点也完全不一样。张之洞力挽的是垂死的旧体制。福泽成长在维新前，未从事维新的政治运动，活跃在维新后。天皇复辟，却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维新并非他一声号令，而是政变上台的新政府挟天皇以推行天下。福泽在1898年脱稿的《福翁自传》中写道：“中国的问题首先在于根绝老大政府，否则，政府即便出什么样的了不起人物，出一百个李鸿章也毫无用处。刷新人心，使国家文明，恐怕除了试以搞垮中央政府，别无妙策。”福泽谕吉认为王制也好，共和制也好，任何制度都各有长短，没有绝对理想的制度，目的只在于实现文明，不同的政治制度不过是为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不同。他也读四书五经，但唐装也好，西装也好，反正都是拿来的，穿脱自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中国人岂能随意做得到。却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又宿命地走进西方文化的阴影里。

福泽谕吉一辈子不做官，却充当“明治政府的老师”。他曾患斑疹伤寒，幸免一死，认定是吃牛肉喝牛奶有效，不仅作文宣扬，而且买大块牛肉宴客。明治年间长大的夏目漱石把文明开化贬斥为浅薄，这种浅薄似乎也正是福泽谕吉的浅薄。今人未必读其书，却无人不知其人，因为福泽活在钞票上。日本流通的最大面值钞票是一万日元，上面印着他的像，已将近三十年，俗称谕吉，数起来不论张，而是一个人俩人仨人。夏目漱石曾留学英国，在帝国大学教授英文学，却终于未入欧，反而回归亚，甚至回到了汉学，他那副愁容也在千元日币上挂了几年，但没人叫它漱石。《劝学书》中多见的“权义(权理通义)”是right的译语，即现今常用的“权利”，这是186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万国公法》的造词。

本书是由福泽谕吉《劝学书》十七篇和《福翁百话》若干篇共同组合起来的。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庆应义塾大学现在也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他的头像也印在人们最爱的一万日元上。

在《劝学书》里，福泽谕吉阐明了自己的思想，从个人到国家、从学问到人望，内容上可说是相当丰富的，但都始终围绕着“平等”这一宗旨；其内容发人深省，到现在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此，我只能说这种思想是不会褪色的，而有时历史则总是惊人的相似。福泽谕吉关于社会的“文明之形”和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两点更可谓是字字珠玑。“维新以后，还不到十年，学校军备都有了很大改善，架设了铁路电报，建造了石室、铁桥等等，这些神速的决断，辉煌的成就，实在让人民感到吃惊。但学校军备是政府的学校军备，铁路电报设施也是政府的设施，

石室铁桥也是政府的石室铁桥，那么最终人民的观点呢？人人都说，‘政府不知很有力量，而且还兼有智慧，远非我们所能及，政府高高在上地管理国家，我们只要依靠他们就行了，忧国之事只要交给上面就行了，实在和下民们没有关系’”。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发展确实离不开市场经济发展、物质建设；另一方面说明一个国家要想自由、独立、强大起来，最重要的还是国民的精神，这一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思想，那么组成的国家也会是空壳。

但是在《劝学书》中，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平等”二字，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现在看来，他的平等的观念多少是有些理想的，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依仗自身力量的强大而欺侮他人的事例屡见不鲜，要改变这类人的思想也是十分困难的事，但多数人们仍然是在朝这种理想的平等前进的，本人在翻译时就产生过如此感慨：或许因为我们人类本身就是一种靠理想而活的生物吧！

本书还选择了《福翁百话》的几篇，内容都是与“学习”有关的，力求保持与《劝学书》的一致性、本书的完整性。《福翁百话》原本是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于1896年3月到7月连载的作品。不同于《劝学书》，《福翁

百话》的内容与《劝学书》中着重“劝学”的文章比较起来，遣词造句更加浅显易懂，内容更加宽泛。而篇幅也不尽相同，既有千余字的短文，也有数千字的长篇大论，但不论长短，其思想之深刻都足以使人深思。比如《论思想的中庸》实际上更像是《劝学书》的延伸，而中庸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中庸，“我们也仍然是日本国民，不能排斥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化，应该懂得从古老的事物之中也可以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果因为在思想的途中会遇到挫折，就表现出一副自己前进玩耍的婴儿的幼稚样子，那就是思想的不平衡，太过看重物质而犯下了错误”，这都体现出福泽谕吉所说的“中庸”是很特别的，他注重的是思想的平衡，挑选这篇也是为了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观点；而《论女子教育和女权》这篇又表明了福泽谕吉本身是个注重女性权利者，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本人认为很有必要挑选出来，这两篇不仅能阐明明治时期的女性主义观点，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福泽谕吉其人。

福泽谕吉最著名的论点恐怕还是脱亚论，他认为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摆脱中华思想和儒教影响，呼吁日本与东亚邻国绝交。在整个《劝学书》里这种理论虽然不明显，

但也始终暗暗地贯穿其中。脱亚论现在看来恐怕是矫枉过正，但对当时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来说，这种偏激的理论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当然这也奠定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基础。在翻译时，我就感觉到，福泽谕吉有很多理论是闪光的，但我们也不能毫无主见地全盘接受。

在译言网上发布译文时，有不止一位网友提出建议，认为明治时期的文章更适合用文言文翻译。虽然在网我已经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但或许读者中也有这种想法的，因此再次重申：福泽谕吉的本意是“劝学”，在现代使用文言文翻译，肯定是达不到“劝学”效果的。因而在翻译过程中，结合了这本书的时代性以及现代人阅读习惯，力求为大家呈现出这部经典作品的原貌。

本人才疏学浅，在翻译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还好有身边朋友和老师的支持，遇到难解的句子偶尔也会和过去指导我的老师讨论，她给了我一些很好的意见。没有大家的支持帮助，是无法完成这次工作的。

柯 泓

2011年4月

孙攀河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福泽谕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非常重要的存在。他在政治动荡、内忧外患的德川幕府末期学习成长；在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明治政府的大变革下积极发表言论，最终成为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他一生先后著述了对于日本近代化发展历程产生巨大影响的《西洋事情》《劝学书》《文明论概略》等书；创办《时事新报》并亲任主编及主要社评撰稿人；创建庆应义塾大学等，在教育、新闻、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都非常活跃，影响深远。

由于他所处的波澜壮阔而又动荡变化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平时的合理化思维方式等原因，使得他的言论显得富于变化，甚至经常自相矛盾。他有时强调人与人、国与国

之间都应该自由、平等、独立，有时又断然主张对朝鲜、中国等国家进行侵略；有时主张东亚联合对抗西欧，有时又不无情绪地说日本应该脱亚入欧等等。在他的生涯和思想当中，深刻鲜明而又多方面地反映了近代日本发展历程中的主要特点。

有关福泽谕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特别是围绕福泽的对外观，以及受福泽影响的日本近代化的特点等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一直到现在还时有争论。这也直接反映出福泽研究在考察日本近代化进程、特点以及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性。

本文将对幕府末期福泽谕吉的著述以及活动进行考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梳理福泽启蒙思想的形成，探讨他的中国观等问题。有关福泽少年时期的文字记载很少，只能以福泽晚年的回忆录《福翁自传》为主，并参考其他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福泽进入幕府之后，相关的书简、著作等文字资料变得丰富，此期间的研究主要以对相关资料的解读和对比分析为中心展开。

第一章 少年福泽谕吉和中国

第一节 童年的生活体验

1835年1月10日，福泽谕吉出生在大阪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父亲福泽百助是中津藩的下士¹，待遇是13石一人扶持²。在大阪的日常工作是与被成为藏元的商人接洽，在合适的时机把从中津藩运送来的大米销售出去。另外在中津藩财政面临周转困难的时候，还要找称为挂屋的金融商人借款³。由于工作出色，自1821年被派到大阪后，一直居住在大阪。福泽百助虽然

1.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内部划分为很多的级别，总体来说分为上士、下士、足轻三大类。以中津藩为例，在总共只有1500名左右的武士中，却设置着近乎100个左右的身份级别和职务。此外由于长时间和平没有战功，所以从下级到上级的提升非常困难，近乎不可能。中津藩200多年的历史中，从最低级提升到最高级的武士只有区区几人而已。通常身份相差悬殊的武士之间也不通婚。

2. 江户时代武士的待遇按照每年领取的大米来计算。当时大米用石为单位，1石=10斗=100升=1000合。据此，每石大米约折合现今的90公斤左右。一人扶持一般指可以多领1.75石的米。加上13石，折合每年大约可领大米1300公斤左右。

3. 天保五年，由于中津藩发行的藩札（藩内通行的货币）贬值，福泽百助与黑泽庄又卫门领受藩命同大阪的金融机构加岛屋交涉，终于借得铜钱数百箱运回藩里，缓解了中津藩的金融危机。